

論顧炎武之文學觀

黃瑞枝

一、引言

明末清初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以當時聲名而論，顧、黃均遠出王氏之上，若專就哲學思想言，顧氏實無特殊理論，黃氏則承劉宗周心性之學，而於政治哲學上有一卓見；王氏立說，亦遠承張載而別立系統，就哲學史標準言，重要性當過於顧氏，然對治學態度及其歷史影響，開一代學風，則顧氏豈常人可及也。

蓋顧炎武之學，乃實事求是，打破漢、宋之分立門戶。經世致用、規模闕大，為有清一代「樸學」、「實學」淵源所自，尤開清代考證、訓詁之學風，進而為近百年之中國史學發展鋪路，是以清代學人大抵皆以「史學」替代「哲學」，實由顧氏治學觀所啓之也。故王國維論清代之學風，謂亭林乃「清初經世學之領袖」。（註1）梁啟超亦謂「對於晚明學風，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態度，影響於此後三百年思想界者極大，所以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註2）實非虛言。

故論其文學思想，當以經世致用為本，注重實踐。主張平易樸實。強調文章要「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註3）且要「闡明義理，記載政事，洞察民隱者，樂道人之善也。」（註4）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荒誕之言，勦襲諛佞之文。」（註5）不僅「有損於己，亦無益於人也。」（註6）實不可為也。是以顧氏與友人書曰：「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於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於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之至手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一切不談。」（亭林文集六）此即顧氏踐履篤實的文學觀，與程、朱哲學，如出一轍。

顧氏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時而作。」（註7）與友人書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註8）此著重人道色彩之文學價值觀，實受韓愈文以載道說之影響，再者，亦受時代背景之衝激。明末，道心頹唐，實必要轉移人心，整頓風俗，此為顧氏立言因素所在。於日知錄卷十九直言篇曰：「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足見顧氏以「救民以言」為其文學價值觀也。

顧氏另一文學觀，貴獨創，切忌摹古，故曰知錄卷二十竊書編云：「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卷二十一著書之難篇亦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曰知錄自序亦曰：「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由此可知，顧炎武著書，最忌摹擬，無一語蹈襲前人。文章應各具風格，自成一派，才見偉大。若改竄前人之作品，竊盜前人之成書，最是無聊。此即顧氏爲文所最重視之觀點也。

是故重實用、貴獨創爲顧炎武文學思想之基本觀點，不論爲學，顧氏誠能踐其言；終身撰著，亦不越範圍，「其標實用主義，實對於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派施一大針砭；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啓之。」（註9）梁啓超所論，實乃真知灼見。

附註：

1. 參閱觀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或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三卷下第七百十三頁所引。
2. 見梁啓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第五十九頁。
3. 見顧炎武日知錄卷廿一文須有益於天下。
4. 同註3。
5. 同註3。
6. 同註3。
7. 日知錄卷二十二作詩之旨。
8. 見顧炎武文集卷四與友人書廿五。
9. 參閱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著。

二、作者生平簡介

顧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字寧人，江蘇省崑山縣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一六一三年），卒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年七十。生父名同應母何氏，兄弟五人，炎武居第二，過繼於叔父同吉，同吉早卒，無子。

聘王氏女貞孝，未婚守節，養顧氏於襁褓，得朝旌。少耿介絕俗，與里中歸莊、玄恭同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己酉夏，起兵吳江，事敗，幸得脫。母王氏避兵常熟。次年，清兵入南都。明亡，炎武生母何氏被游騎砍斷右臂，弟子叟、子武並遭難。養母貞孝聞變，遂絕食卒，遺言勿仕異朝。唐王以職方召，未赴。有欲謀害之者，遂去家遠遊河朔，往來江、浙、齊、燕、秦、晉之間，四謁孝陵，六參思陵。康熙朝薦為博學鴻詞科，撰修明史，亦不赴。受母教，故君喬木之思可知。亭林自負用世之略，卒不得不遂，所至輒試於壘殖，其甥尚書徐乾學累書迎之，不歸。壘田於五台之東，雁門之北，累致千金。晚居陝西之華陰，置田築舍，以至於死，年七十。門人奉歸葬崑山，其高足潘耒（次耕）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日知錄最盛行。宣統初，從祀孔廟。（此據張穆論年譜）

亭林幼承家學，稟負異資，研讀九經諸史，過目成誦。稍長，即潛心於經世之學，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以致公移邸鈔。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實而行，不泥古空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後周遊西北二十年成書肇域志，又精研金石文字音韻之學，著求古錄、金石文字記、音學五書、韻補正論古今音學之變，究研金石之文。

生平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註1）自標。明亡不仕，束書遨遊大河南北，留心山川名物史跡之訪察探證，以振民俗，講廉恥為己任，蔚成「經世致用」之樸學，歸於功利實用之科技，開拓清代學術研究之風氣，揭示研究之門徑與方法，故為清代學術開山之第一大師，清史儒林傳之魁首也。

附註：

1. 見顧炎武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三、析論顧炎武之文學觀

關於顧炎武之文學觀，散見於其文集、日知錄中，雖零亂支離，若融會貫通之，仍可窺出蛛絲馬跡，連成體系。茲分創作、技巧、評論三者析論之，以明其文學觀之梗概。

（一）文學創作觀

顧氏以為文章首要獨創，切忌摹古。雖為文須先淵學博古，以奠基，然創作則須去古之跡，是以避用今名用古名，避用今字用古字，不啻「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碍者也。」（註1）故文章貴有風格，自成一家，竄改前人作品，竊盜前人成書，最

可恥愧。日知錄卷廿一文人求古之病篇曰：「剽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又曰：「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運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猶曰：「近時乃或抄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由此可見抄掇非謂文「工妙」，而文之雅俗，亦不在此。又曰：

「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日知錄卷廿一文人求古之病）

顧氏此種言論，乃針對矯治明代文壇弊病而發。蓋明朝文人如李東陽、李夢陽、何景明、王慎中、唐順之、王世貞、李攀龍等皆摹擬秦、漢、唐，文風瀾漫整個文壇，顧氏見此句摹字擬，僅得古人皮毛，而遺棄神理，故反對之曰：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諺也。」（註2）

又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錄卷廿一文人摹倣之病）顧氏反對文人摹古之習氣，不僅倣作不及創作，且其文體理論亦使然。蓋文學乃一進化之物，是以「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註3）文學既隨時代進化，則詩文便應具備時代風貌，何貴求古摹古哉！故顧氏曰：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數千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註4）

觀此可知摹倣，顧氏所最厭惡者也。其言曰：「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註5）是不以依傍摹古爲能事，而以獨創新見爲生命也。

（二）文學技巧觀

於文學著作，顧氏以爲要博引旁證。不論事蹟、文物、詩句、詞字等皆需一一博證，綜合研究其異同，以期下手而無謬誤，然後歸納，方下定說也。是以其講求文學技巧，首要重讀書，認爲「著書不如抄書。」嘗自述先祖之教曰：

「著書不如抄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文集卷二抄書自序）

顧氏畢生學問皆以抄書入手，即以抄書爲著書之技巧，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自言曰：「歷覽廿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註6）爲肇域志亦自言曰：「閩志書一千餘部。」（註7）其勤於抄書之精神可見一斑。至若曰知錄尤爲抄書工夫之至精細者。其言曰：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剝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曰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乎山之銅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十）

由此可知抄書之不易，蓋資料之蒐羅與別擇，實佔學術著作十之七八。後王引之之經傳釋詞、經義述聞；陳蘭甫之東塾讀書記，皆仿此也。倡讀注疏，其意在於反虛入實，正所謂講明經學之理學也。其推重注疏之語，見於日知錄者頗多。如卷十九明經條曰：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今之學者，並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卷十九北卷條亦曰：

「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叁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爲何物也。」

與友人論易書又曰：

「注疏刻於萬曆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清儒學案卷七，亭林學案下）

可見明人既以不讀注疏而荒經學。顧氏乃一再慨歎而主倡變易之，不意其收穫非埋學，而爲考據也。日知錄卷十九擬題條曰

「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

「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顧氏移於撰文之法則，是以顧氏自注引宋史劉恕傳曰：

「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更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朱子之說見於貢舉私議云：

「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斷以己意。」

移答卷之法著文，自可發展至於考據，即條舉衆說，斷以己意。此仍爲其文學特殊技巧觀點，不僅言之有序，且言之有主見。日知錄卷十九經義策論條曰：「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顧氏自注曰：「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灑指而退矣。」治詞章者，究心典故出處，因而通考據，前人不乏其例。顧氏爲補救明人僅讀時文之弊，主張須讀注疏，爲文引書須注明出處，其風流行既廣，考據學由是遂興矣。此乃顧氏所持著作之嚴正態度，一須博證，二須虛心，三須精慎。故其言曰：「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又曰：

「古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爲之。……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也。」（日知錄卷廿一著書之難條）

由此可見著述爲文，要虛心，要精慎，愈速則不達，愈多而愈舛漏，豈可輕忽？潘次耕請刻日知錄，其初刻日知錄自序曰：「舊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早……漸次增改……而猶未敢自以爲定……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上段可見其撰文虛心精審之態度。日知錄卷十自視歛然條曰：「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是以日知錄閩百詩駁正若干條，顧氏欣然採納。（註8）音學五書經張力臣刊正一、二百處。（註9）其言曰：「時

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註10）此爲文謙虛之心態，博證精慎之技巧，足爲後學之楷模也。故四庫提要曰知錄云：

「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少抵牾。非如楊慎、焦竑諸人之偶然涉獵，得一義異同，知其一不知其二。」

顧氏造詣之深，及論斷之精駭，可見一斑。全祖望曰：

「凡先生之遊，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註11）

蓋顧氏研學作文之要訣，即在論事舉證，且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所信，其自述治音學曰：

「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叁伍以諧其韻。」（音學序）

此所用文學技巧者，皆近世科學之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守其習，此即清代盛行之考據學也。

（三）文學評論觀

炎武曰：

「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教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木者，皆不足以此也。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註12）

可見顧氏讀書爲文，非雕琢字句而已，將以見諸行事。以爲文章須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是以信古尊經，乃以爲通經即可解決政治、社會問題，此即所謂「明道」與「救世」之學也。故其文學之批判，也皆以此爲準繩。其言曰：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註13）

是知亭林平生著述，著意於日知錄、音學五書，在明道、救世，而非重視純文學。以爲詩詞歌賦乃雕蟲篆刻，故其文學之價值在於濟世濟民，文學評論觀當在於救世濟民爲大前提。不合乎此，將無法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豈可爲今人道也。是以篤志經史，全在於經術、治道。其言曰：「愚不揣：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卷四與人書三文集）又曰：「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治音韻

爲通經之鑰，而通經爲明道之資。明道所以救世。顧氏文學觀即此意，標揭文學價值，在此「救世」、「致用」之宗旨而評論。通經以致用，顧氏視爲當然。蓋通經即足以建立制度。所謂「文」與「禮」。故曰：「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數度，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斯節斯之謂禮。」（日知錄卷九博學於文）又曰：「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學。」（註14）此文與禮二觀念，合以指一切制度儀節，而顧氏亦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八字教人。所謂「博學於文」即與重視制度儀文之主張不可分，而其重視經學之主張，亦以「文」觀念作爲基礎也。

顧氏以爲學者應通經以博文，即談狹義之「文」，以爲文辭必供解經或治事之用。曾曰：

「文以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有多一篇之益矣。」（日知錄卷廿一文須有益於天下）

此所謂爲文須「有益」，而不承認純粹文學之藝術價值也。其又曰：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傳，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而宋劉贇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日知錄卷廿一文人之多條）

此則譏「文人」，以爲文人若「不識經傳，不通古今」而僅以文名，不足垂範。可知顧氏文學批判，以尊經信古爲準則；以救世爲目的。此救世之具體主張，則仍歸於通經致用，故亭林之文學，即以「實用」、「經世」爲價值論。日知錄一書發揮此觀點，最爲淋漓盡緻。顧氏自謂日知錄一書，意即「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與楊雪臣書）又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文集與人書廿五）其門人潘耒爲日知錄作序猶曰：

「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雜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賢，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異日有整頓民物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此標舉通經致用，乃在救民濟世也。故亭林之文學評論觀在於實用，在於經世，是謂實踐文學，又可謂救世民生文學。

附註：

1. 見日知錄卷廿一文人求古之病。

2. 見日知錄卷廿一文人事做之病。
3. 見日知錄卷廿二詩體代降。
4. 見日知錄卷廿二詩體代降。
5. 見亭林文集與人書。
6. 見亭林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自序。
7. 見亭林著肇域志自序。
8. 見趙執信所作閩塞志。
9. 見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
10. 見日知錄卷廿一述古條。
11. 見全祖望著結琦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12. 見亭林文集與人書三。
13. 見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廿五。
14. 見日知錄卷九博學於文。

四、結論

顧炎武生於明末清初，受政治衝激，以致從事實學，經世救民。所謂實學，乃實踐修身、研析經籍，從事考訂，收錄古蹟，編纂歷史，於是開清代乾、嘉經學、考據之先聲，為清學術之領導者，故專標「博學於文」一語。所謂「文」者，非辭章之謂，按「文」之本訓，指木之紋理，故事務之條理，皆謂之「文」。日知錄卷九「博學於文」條闡明得十分透闢，其言曰：「自身而至於國家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此「文」非指狹義之文藝，乃為廣義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工具。故其文學觀是民生史觀，是實踐文學，為修身、治國之政治手段。故與民生無關、與政治無利、與國家天下無影響之宋明理學，乃極力反對痛斥。其解釋論語曰：「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行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註1）其意標榜文學乃人之言行與天道，是倫理，是形而下，是現象之形容，是日常生活實用之文埋，

無須隱沒，無須高蹈談玄。故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言也。此即顧氏所力倡之文學史觀。故其言曰：「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註2）顧氏極力反對清談，空言而力主修己治人之實學，此即人道主義色彩濃烈之文學思想，考其原因，一者受韓愈文以載道價值觀所影響，再者受時代背景影響，尤為深鉅。

是以顧氏之文學觀，以獨創、博證，致用為其本旨。務使文學有利於民生、社會、國家，不尚空談心性、埋則學，排擊王陽明，崇尚朱熹，皆以實用為著眼點，是以清唐鑑學案小識曰：「夫先生之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而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註3）其文學思想重實學，可見一斑。李文貞顧寧人小傳曰：

「自幼博涉強識，好為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考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頽阻，有古碑版遺跡，必披榛菅，拭斑藓，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張穆顧亭林年譜卷四）

潘次耕日知錄序亦曰：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負絕域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建樹，而迄不得試，窮老以終，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索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日知錄卷首）

由上兩段可見顧炎武為學撰著，皆事事求實，博證、貴創、作文章則事必關民生國命，考山川風俗，疾苦利病，以篤實其文章之內涵，援古證今，以壯其獨見之氣勢。微文碎義，無不考究，是以六書音義，尤有獨得，此全為其實踐、致用、貴創之民生史文學觀所使然。故稱其為通儒也。全樹山曰：

「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良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未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於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亭林先生神道碑）

顧氏之實用、民生之文學史觀，致使其治學蒐集檢討，而重博證，銖積寸累，取之於朱子，開盛中清漢學家考據學風之先例。修己力行以務實，致用當前而歸於實踐，貴獨創博證，為清初樸學思想開創新局，貢獻良多，實非尋常重視詞藻、形式之

風月文學所可比擬。

附註：

1. 見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2. 見註1。
3. 見唐鑑清學案小識卷三崑山顧先生。廣文書局。

參考書目：

1. 原抄本日知錄（上、下集）顧炎武著。中台印刷廠印行。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出版。
2. 清儒學案：亭林學案（上、下）。徐世昌撰。
3. 顧亭林詩文集：四部備要集部。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4. 亭林先生神道碑：附於鮚埼亭集。全祖望撰。
5. 顧亭林先生年譜：張穆著。商務印書館。民五十四年十二月台一版。
6. 亭林學術述詳：何貽焜著。正中書局。
7. 亭林思想述要：林葱著。樂天出版社。
8. 中國哲學思想史清代篇。羅光著。學生書局。七十年十一初版。
9. 顧寧人學術之淵源：牟潤孫撰。民主評論。五卷四期。
10.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著。商務。民五五、二台三版。
11.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著。華正書局。六三、一〇台一版。